

《歸田錄》、《東坡志林》 二種筆記中日常書寫 之風貌與意義^{*}

劉師健

提 要

經魏晉至唐代的逐漸轉變，宋代筆記不再拘泥於補史之闕，而是以記錄身邊百事乃至個人經歷、心情感悟為旨歸。衆多筆記中，歐陽修的《歸田錄》與蘇軾的《東坡志林》在承有紀實的史學傳統時，記錄日常，平凡俗事之中，見出新奇，傳達意味，具有了資閑談與“自怡”的性質，顯示出對傳統筆記紀實性的新發展，是為拓展了筆記在表現內容上的寬度和廣度。其關注個體日常生活表現內在情韻的文本因素為後世筆記創作提供了新的審美視角。

關鍵詞：《歸田錄》 《東坡志林》 日常轉向 世俗化 人文化

經魏晉至唐代的逐漸轉變，宋代筆記不再拘泥於補史之闕，¹ 而是以記錄

*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宋代筆記的文體自覺與新變研究”(19FZWB070)的階段性成果。“中國闡釋學理論資源整理及譜系研究”(湘發改投資[2021]120號)。

1 《四庫全書總目》在子部雜家類論“雜說之屬”時，對筆記的特徵做了如此論述：“雜說之源，出於《論衡》。其說或抒己意，或訂俗訛，或述近聞，或綜古義，後人沿波，筆記作焉。大抵隨意錄載，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後，興之所至，即可成編。故自宋以來，作者至夥，今總彙之為一類。”見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701。指出“筆記”是隨筆載錄議論雜說、考據辨證類雜著的文類概念。本文的“筆記”概念依此說，筆記源流中志怪一派不在論述之列。

身邊百事乃至個人經歷、心情感悟為旨歸,大多又都是在經過人生歷練之後的經驗之作,誠如《五朝小說·序》中所言:“唯宋則出土大夫之手,非公餘纂錄,即林下閑談。所述皆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或履歷見聞、疑誤考證;故一語一笑,想見先輩風流。其事可補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闕。”² 在其眾多的筆記中,歐陽修(1007—1072)的《歸田錄》與蘇軾(1037—1101)的《東坡志林》在承有紀實的史學傳統時,記錄日常,反映現實的特徵尤為凸顯,對後世筆記的創作範式影響深遠。以往關於兩書的研究,或關注其文獻史料價值,³ 或探討文本的思想內涵與藝術風格等文學方面的成就,⁴ 其書寫的日常轉向則還尚未得到學界的充分關注,鑒此,本文就兩書表現出的諸多新變進行探討,力圖揭示其書在筆記發展歷程中的轉型、示範作用與文學史上的意義。

一、二種筆記資閑談與“自怡”的特性

筆記一體,因與道聽途說的古小說的複雜淵源關係,創作中寫作與娛樂並行不悖的傾向比較明顯。這在中唐筆記中便已露端倪,⁵ 其時諸多筆記都是在閑談之中產生的,“當時士大夫們在宴會聚首時,或在旅次相遇時,常常講說新聞故事以作娛樂消遣”。⁶ 他們或據聽聞而徑錄朝堂故事、或記名流軼事、或載

2 掃葉山房輯:《五朝小說大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頁271。

3 從文獻學角度研究的論文有章培恒、徐艷《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兼談十二卷本〈東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張海明《歐陽修〈六一詩話〉與〈雜書〉、〈歸田錄〉之關係——兼談歐陽修〈六一詩話〉的寫作》(《文學遺產》2009年第6期),李樂凝《〈東坡志林〉考論》(《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7年第1期)。

4 從文學角度研究的論文有譚磊《試論〈歸田錄〉對〈唐國史補〉的法與不法》(《安徽文學(下半月)》2014年第4期),劉師健《〈東坡志林〉:審美趣味與書寫策略》(《求索》2016年第3期),李佳《歐陽修筆記〈歸田錄〉的獨特風貌與文化意義》(《吉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李晨曦《〈東坡志林〉〈仇池筆記〉文體學意義研究》(貴州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孫宗英《轉向閑適的日常:論〈歸田錄〉的體式創格及筆記史意義》(《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5 關於唐人筆記的娛樂性,可參嚴傑《唐代筆記的娛樂性》一文。見嚴傑:《唐五代筆記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8—43。

6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頁16。

各地風俗，賦予了筆記世俗化、平民化的特質。孫棨(約 889 年前後在世)《北里志》寫成於中和四年(884)，其時作者“頻隨計吏，久寓京華”，⁷是尚未及第的舉子，其書主要記載中和以前長安城北平康裏的歌妓生活。高彥休(854—?)《唐闕史》其書寫作主要是“或有可以為誇尚者、資談笑者、垂訓戒者，惜乎不書於方冊，輒從而記之”，⁸內容取舍上呈現出世俗化、娛樂化趨向。

宋代筆記承接了唐代筆記資閑談的性質。如王闢之(1031—?)《澠水燕談錄》自序云：“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饑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閑接賢士大夫譚議，有可取者，輒記之。”⁹明確表明是從閑談中獲取寫作筆記的資料。吳處厚(?—1091)對此言：“前世小說有《北夢瑣言》、《西陽雜俎》、《玉堂閑話》、《戎幕閑談》，其類甚多，近代復有《閑花》、《閑錄》、《歸田錄》，皆采摭一時之事，要以廣記資講話而已。”¹⁰“廣記資講話”正說明了宋筆記創作承接唐人娛樂動因的事實，只是這種創作動因在宋型文化中，又有了一些新變。

其新變體現在從唐代筆記更多用以娛人(為好事者作談資)而轉向自娛，這一方面源於宋人內斂的精神性格，另一方面又與筆記多作於作者退隱閑居之時或地處偏遠之所相關。如張洎(934—997)《賈氏譚錄》序云：“庚午歲，予銜命宋都，舍於懷信驛。左補闕賈黃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雅，善於談論，每款接，常益所聞。公館多暇，偶成編綴。”¹¹蘇轍(1039—1112)《龍川略志》序云：“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略，蓋亦無足記也。”¹²羅大經(1196—1252 後)《鶴林玉露》云：“余閑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令童子筆之。”¹³在閑居生活中，身處窮鄉僻壤，孤獨寂寞，乃繙書以自娛，於是，他們或追憶前塵往事(如張洎)，或繼續闡發自己的主張(如蘇轍)，或潛心書本鑽研

7 孫棨：《北里志》(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1。

8 周勛初：《唐代筆記小說叙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121。

9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冊2，頁1226。

10 吳處厚：《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7。

11 張洎：《賈氏譚錄》，《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1，頁238。

12 蘇轍：《龍川略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

13 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

學術(如羅大經),於筆記創作中娛情遣性,寄托個人旨趣。

《歸田錄》同樣有著“自怡”的創作傾向,其序中明言:“與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覽也。”¹⁴其書是為閑暇時記錄笑談之語,開啟了筆記“日常”的書寫模式。美國漢學家艾朗諾(Ronald Egan)即指出:“筆記的身分有點模稜兩可,不能算是純粹的文學作品,但我們不妨將之視為是一種由文人記錄的文化現象,而且它關注日常,關注下層人民。歐陽修的《歸田錄》是一個轉折,在他之前,宋代筆記記載的多數是宮廷、官員的稗史、軼事,還有部分志怪的內容。但在他之後,筆記的題材、範圍大大擴展了,敘事的格調也變得輕鬆詼諧。”¹⁵《歸田錄》的創作是為改變了以往筆記注重的志怪傳奇傾向,轉而反映現實,轉向日常、當下。其創作的新的傾向為後來諸多筆記所效仿,隨後,蘇軾《東坡志林》等作品皆其中《東坡志林》承續其風格,記事中述懷抒感,景與情融,心入其境,其關注點轉向了日常的人事。

從內容來看,《歸田錄》、《東坡志林》重點記錄的是文化歷史與日常生活,以往筆記重點著墨的史實之闕與資政諫漸次退居次要位置。李偉國曾針對宋神宗得見《歸田錄》序文,而想傳看其書,歐陽修由此更動砍削文稿之事,在《歸田錄佚文初探》中指出:“歐陽修把這個筆記定名為《歸田錄》,是因他的坎坷不平的仕宦道路有關。”¹⁶黃進德同樣認為,《歸田錄》中不少關涉當代人物諫諍正言的載錄,展現了北宋諍臣實事求是以商榷是非的立言發聲精神。¹⁷結合其書屢屢關於其時代人物言行的截錄以及諸多作者對此言行的評議取向,是可窺見作者於書中所關涉的北宋政壇、士風等宋初社會的諸多文化現象。《東坡志林》其書所載為作者自元豐至元符二十年中之雜說史論,內容廣泛,縱橫上下古今。明朝學者、藏書家趙用賢(1535—1596)就曾指出:“其間或名臣勳業,

14 歐陽修:《歸田錄》,《全宋筆記(第一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冊5,頁236。

15 季進:《另一種聲音——海外漢學訪談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9。

16 李偉國點校本《歸田錄》附錄二《歸田錄佚文初探》,見歐陽修:《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60—66。

17 參見黃進德:《歐陽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58—362。

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夢幻幽怪，或神仙伎術，片語單詞，諧謔縱浪，無不畢具。”¹⁸兩書重點著墨於其逸聞軼事、仕宦經歷、日常瑣事、生活情態，這對了解歷史文化思想、士人生活與文人心態均具有極高的認識價值。

《歸田錄》、《東坡志林》的文體功能更加豐富。歐陽修性好戲謔，常以筆墨自娛，“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¹⁹遊戲文字是其一貫的寫作方式。《歸田錄》序中“史官之所不記”“探物理”“辨疑惑”“采風俗”的表達以及“笑談之餘”“助談笑”“備閑居之覽”²⁰的寫作目的，反映出作者寫作伊始就已設定記錄“戲笑不急之事”的寫作傾向，正是在這種閑適諧謔的寫作原則中，文本中綜合運用了多種表達手法，別具搖曳之美。蘇軾就曾指出：“古之觀人也，必於小者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顏樂亭詩并敘》）²¹因而，即使在《東坡志林》這種小小的“手澤囊”中，²²作者快意為文，可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²³寫景、寄情、敘事、寓理兼備，相比那“高大文冊”，於這“小文小說中”，更見“坡公之可愛”。²⁴在作者這種創作思想與心理的導引下，以前筆記單純記錄怪異、史實的功能，已無法滿足他們表達文化情懷和人生思考的需求，筆記中，他們記錄著百姓的日用、民俗風情，關注著士人的人格修養與志趣涵茹，始將敘事、抒情、議論、考據等眾多功用揉入筆記之中，樹立了筆記寫作的重要模式。

從後世對兩書的定位也可看出其日常轉向。《四庫全書總目》將傳統目錄學對《東坡志林》從子部小說家類改劃入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對《歸田錄》的

18 趙用賢：《刻東坡先生志林小序》，見蘇軾：《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序頁1。

19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843。

20 歐陽修：《歸田錄》，《全宋筆記（第一編）》，冊5，頁236。

21 蘇軾：《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777。

22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773。

23 何蘧：《春渚紀聞》卷六引蘇軾語。原文為：“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何蘧：《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84頁。

24 袁中道《答蔡觀察元履》指出：“今坡公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見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045。

歸類由子部小說家類細入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是為見出了《歸田錄》、《東坡志林》雜錄叢談的性質。可見，就其記述內容、文體功能與文體地位而言，兩書從個人視角出發，或記人，或記事，或品評人物，泛話古今，述懷抒感，借助人事來闡釋撰述者的文化認同，使筆記具有了資閑談與“自怡”的性質。

二、二種筆記書寫的“世俗化”與“人文化”特徵

二種筆記書寫中世俗人文因素日漸增加，呈現出書寫對象世俗化與書寫方式人文化的特徵。

筆記書寫對象世俗化是指筆記開始將自己的日常生活、情感融入其中，筆記的紀實性特徵更為明顯。其一，記錄個人化的日常生活。《歸田錄》中記錄了諸多“不屬於那些與政治相關的、有用的歷史細節”。²⁵ 全書一百一十五條，有三分之一的條目指向或涉及日常生活層面。作者以飽含溫情的筆觸記錄當年的元夕賜宴、玉堂舊事、禮部唱和，記錄自身所作的某些精妙貼切的制詞，記錄京師市井生活中令他感興趣的諸多瑣事，顯示出作者對日常生活的關注與深切體驗。《東坡志林》中諸多關於作者個人化的日常生活情態的記錄。如“赤壁洞穴”中，記遊玩赤壁洞穴時，撿拾石子二百七十枚，乃以古銅盆盛之，並將其長相奇異的石頭命名為“群石之長”之事。²⁶ 即使是書中諸多關於夢境的描寫，其夢中的景象亦關乎他的人生經歷與思想觀念。如“記夢參寥茶詩”條，²⁷ 記自己夜夢參寥法師（1042—1117）攜詩造訪，覺而記其詩語之事。蘇軾後來在《參寥泉銘并敘》一文中，敘述這件事時，還曾寫道：“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於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久矣。’……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身。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

25 艾朗諾：《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51—52。

26 蘇軾：《東坡志林》，頁75。

27 蘇軾：《東坡志林》，頁15。

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²⁸文字中即說明了曾經夢中與友人關於《飲茶詩》所展開的討論，未料日後竟成爲了對作者現實人生境況遭遇的一個預兆，由此可見，作者夢中所記，亦是其人生經歷與日常生活情態的見證，純然是充滿世俗的、新奇有趣的日常生活與個人經歷。

其二，記錄民間風俗趣聞。《歸田錄》中諸多關於生活竅門、意趣故事的記載，賦予其一種來源於民衆的鮮活生命力與感染力。如卷一第二條關於民間能人巧匠的記載，記載都料匠預浩造開寶寺塔，考慮到塔址的地形氣候，由於西北風之故，乃使新塔向西北傾斜，塔百年之後方得以正，從而比其它塔具有更長的壽命。²⁹還有卷二第四十八條寫都城人識得金橘的過程，詳細記載了京師人愛金橘的由來，其後還介紹了歐公家鄉人關於金橘保鮮的方法。³⁰《東坡志林》中亦有不少此類記錄。如作者戲謔蘄州人龐安常（922—979）善醫而耳聾的事情：“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乎？”³¹這些不爲世人所解的極不尋常的民間趣事，《志林》中記載甚多。還有關於眉州青神縣道側靈異神秘的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³²在墓冢中進食蟾蜍之氣而存活下來的嬰兒等的記載。³³正是這些民間風俗趣事的記錄，使兩書充滿了一種濃鬱的民間世俗意味。誠然，晉唐筆記中並非完全沒有世俗化的內容，如以《世說新語》爲代表的誌人筆記，就代表著這一傾向。唐代筆記中表現世俗人情與史料類筆記，亦屬於這一範疇。在此層意義上，宋代筆記的世俗性，也可以說是對晉唐這一傳統發展、擴大化的結果。只是諸多筆記記錄的場景已基本從鬼神志怪轉移到人世間和日常生活，其場景的改變帶來寫作方式的改變，顯示出與晉唐筆記不同的重紀實的傾向。

筆記書寫方式人文化突出表現是重理性的色彩。理性色彩的加強，在表達方式上表現爲重議論的特點。筆記中融入議論的表達方式，經歷了一個漸

28 蘇軾：《東坡禪喜集》（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頁162—163。

29 歐陽修：《歸田錄》，《全宋筆記（第一編）》，冊5，頁237。

30 歐陽修：《歸田錄》，《全宋筆記（第一編）》，冊5，頁266。

31 蘇軾：《東坡志林》，頁15。

32 蘇軾：《東坡志林》，頁54。

33 蘇軾：《東坡志林》，頁52。

進的發展過程。在唐代,筆記作者在其作品中,並不表露個人化的語言與個性化的評論,多是述而不作,如李肇(?—約 836)等人的作品多隸屬於史部,歷代各類公私目錄書也多是將其劃入到“史部”,或雜史類或傳記類。³⁴ 五代宋初之時,這種嚴格控制個性化評論的撰述傾向有所緩和,孫光憲(901—968)《北夢瑣言》中,就開始摻入了個人化色彩的議論,效仿“太史公曰”的方式,多次以“葆光子曰”發端,闡發個人見解。其後眾多的筆記,諸如多部他人追憶式筆記,《丁晉公談錄》、《楊文公談苑》、《宋景文公筆記》、《王文正公遺事》等,筆記中均直接以所記述主人公的視角,闡發對於具體事件的評論,這類著作的撰述旨在以人存言,個人化色彩得到的增強,但著述者自己的議論語言卻甚為少有或幾乎沒有。³⁵ 至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張齊賢(942—1014)寫成《洛陽搢紳舊聞記》,則又有所新的變化了,作者開始以“余”的口吻出現在文中,如序中“余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搢紳舊老善,為余說及唐、梁已還五代間事”。³⁶ 卷二“齊王張令公外傳”條:“余少時,親聞舊老所說……余親見後載、長夏等門堆積材木。”³⁷“虔州記異”條:

余在江南掌轉輸之明年……余求得法定鄉人徐滿者,少與之狎……余遣滿招之,赦其罪……余未半歲,自京奏公事回,泝流至虔州……余自暫離洪州來上京,卻歸江南……余未及解帶,懷琪獨候謁,未及與接談……余亦惘然嗟歎者久之……余告以起發之由,且請諸公不得出門……余驚起問之,即懷琪之虞候爾。³⁸

文句中,敘及了作者的個人經歷,也凸顯了作者主體性的評論。歐陽修《歸田

34 知見所及,僅見《八千卷樓書目》、《四庫全書總目》等少量目錄書將其列入“子部小說家類”。

35 《宋景文公筆記》、《楊文公談苑》、《王文正公筆記》等筆記中,撰述者一般於行文中,通篇貫穿對宋祁、楊億、王曾等名公巨卿的仰慕之情,感情基調甚為單一,與作品中著述者個人化的議論不屬同一概念。

36 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年),頁1。

37 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頁11—14。

38 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頁17—19。

錄》由此接續張氏著作，既富個人化色彩，又有著述者自己的議論語言。

歐陽修雖自言“不書人之過惡”，看似消弭了褒貶評價和個人化議論的特點，但幽微婉曲的議論多貫注於行文之中。卷一第二十八條，記述百姓訴李漢超(約907—977)“貸民財不歸”“掠民女為妾”一事，多處細節描寫，突出了太祖善馭臣下的雄才謀略。如太祖召見百姓，其躬親態度可見一斑：“賜以酒食，慰勞之”，對此，百姓感激不盡：“感悅而去”，並且太祖最後還囑咐道：“汝自還之”，由此，李漢超最後的反應是“感泣”，³⁹就是通過這一系列的細節描寫，太祖鎮定自若的應變能力、安撫人心的獨特效果與籠絡武將的雄韜偉略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同時歐陽修個人對於太祖不絕如縷的頌揚也就悄然地融入在字裏行間之中了。這種融貫於行文之中的幽微隱曲的議論方式，在《東坡志林》中得到了很好的繼承與發揚。如“記遊松風亭”中，⁴⁰記敘了作者遊松風亭的小事與感想。在記敘日常散步之事中，登松風亭未遂，卻覺悟到即時放下、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悟出令自己精神解脫的人生至理。信步山野中排遣愁懷，領悟自然玄機，由記敘而生發議論，僅記作者生活中的一點感受，並不追求情節的完整和事理的嚴密，思之所至，筆亦隨之，“極有布置而了無布置的痕跡”。⁴¹ 還如“論修養帖寄子由”，此文寫在元豐六年(1083)，烏臺詩案後四年時間。蘇軾此時被貶黃州，在黃州的蘇軾，寫給弟弟子由論修養帖。先與子由討論“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的修養問題，後用“書至此”一句，⁴²自然過渡聽到窗外凶悍婦人和丈夫毆打謾罵之事，雞飛狗跳，儘管日子不得安寧，但是他們生活的真味就在這吵架的過程中得以呈現。行文恰似江河鑿物，水流過草，柔情款款，水擊打石，濺起浪花。這些條目均是在多種表達方式中，於字裏行間融進作者的所思所感以及鮮明的情感立場。

主體性更內在的表現是在私人化生活記載的表層下，作者個人情感、思想

39 歐陽修：《歸田錄》，《全宋筆記(第一編)》，冊5，頁244—245。

40 蘇軾：《東坡志林》，頁4。

41 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31。

42 蘇軾：《東坡志林》，頁8。

和人格精神的流露。作者往往通過自身的視域，敘寫自身的生活與命運、情趣與願望，自由的表達情感。誠如呂叔湘(1904—1998)所言：“隨筆之體肇始魏晉，而宋人最擅勝場……或寫人情，或述物理，或記一時之諧謔，或敘一地風土，多半是和實際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⁴³作者關於文藝、學問、人事、世態的意見與感想都在筆記中得到了展現。《東坡志林》中，作者在“記遊松江”中留戀昔日與友人“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歡愉宴飲的交流情景，⁴⁴抒寫了作者孤寂淒涼，無所歸依的心境，表現了蘇軾對人生的執著與眷戀。“憶王子立”中，開篇回憶了與友人、王氏兄弟在一起的歡樂場景，聽簫音悠揚，眾人飲酒對詩，不勝美景，無限樂事。而如今張師厚已逝去多年，今年王子立又不幸英年早逝，至哀哉兩字，戛然而止。⁴⁵回味之前美景樂事，仿佛明月花酒都載滿了離愁，寫滿了孤獨落寞。“陳氏草堂”中，全文對草堂的形制、布局、環境、變遷、人事等一律不涉筆墨，僅抓住“落於堂後”的瀑流進行刻畫。連用三個喻體，寫瀑布“如懸布崩雪，如空中絮，如群鶴舞”，三層聯喻，由物象而意象而幻象，生動展現了雄偉壯觀、純潔縹緲的自然景觀，接下來文脈忽然中斷，另辟途徑，記朋友間的謔語。待最後一筆，“參寥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⁴⁶猛然掉轉頭來，與瀑流相呼應，全文頓時揉為一體。先對瀑流作正面描繪，然後以人事作側面烘托，有明有暗，若斷實連，跌宕多姿。

三、二種筆記日常書寫的筆記史意義

《歸田錄》和《東坡志林》以散文的手法，更為細緻地描寫個人生活，並且筆記中日常化書寫中注重突出自我的存在，但並不是刻意美化自己，而是展現出日常生活中真實的、有著常人般喜怒哀樂的自己，將日常平凡之物與自己的情感融合一起，體現出對文人自我生活狀態和情感體驗的關懷，著重書寫私人日

43 呂叔湘：《筆記文選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2。

44 蘇軾：《東坡志林》，頁3。

45 蘇軾：《東坡志林》，頁5。

46 蘇軾：《東坡志林》，頁79。

常中的文人雅趣，以極高的藝術手法提升了平凡瑣屑之物的意境，這種日常轉向的書寫擴寬了筆記的表現領域，一定程度上開啟了後世筆記的撰述範式。

一方面，大量文人筆記中充滿了對於世俗日常生活瑣事的記述，鍾情於“無關宏旨”的生活瑣事，偏於“里巷閑談詞章細故”。很多記載都只是片段的隨想，或為“史官之所不記”的朝廷軼事，或多載“嘉言韻事”，⁴⁷或詳於各地風俗及民間雜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事無巨細，作者都隨即錄之於筆端。如范鎮（1007—1088）《東齋記事》序云：“予嘗與修唐史，見唐之士人著書以述當時之事，後數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來蓋希矣，惟楊文公《談苑》、歐陽永叔《歸田錄》，然各記所聞而尚有漏略者。予既謝事，日於所居之東齋燕坐多暇，追憶館閣中及在侍從時交遊語言，與夫里俗傳說，因纂集之。”⁴⁸又如四庫館臣謂《塵史》“凡朝廷掌故、耆舊遺聞，耳目所及，咸登編錄”，⁴⁹謂《高齋漫錄》“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跡，以至文評詩話詼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⁵⁰這些筆記多是作者耳目所接，意興所至，筆亦隨之。其胸襟氣質，才學見識，生活風貌和創作特色，往往也袒露得直接而鮮明。無怪乎程毅中所言：“‘筆記’一詞本指散文的一體。”⁵¹程千帆（1913—2000）在談及宋代筆記時亦說：“這些為數極其眾多的作品，自然只是出於作家們的隨手記錄，而不是什麼精心結構的東西。但也正因為不是刻意為文，社會的真實和作家的靈魂也就容易自然流露。”⁵²

另一方面是筆記創作有著對內在心理平衡的自覺追求，寫作常常只是為了聊以自娛。如《西溪叢語》之作者姚寬自謂：“余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采者，因綴緝成編，目為《叢語》，不敢誇於多聞，聊以自怡而已。”⁵³又如洪邁自述其《容齋隨筆》的寫作狀態：“時時捉筆據

47 參見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79—180。

48 范鎮：《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

49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頁1036。

50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頁1197。

51 程毅中：《漫談筆記小說及古代小說的分類》，《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3年第3期。

52 程千帆：《儉腹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119。

53 姚寬：《西溪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

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⁵⁴沈作喆自稱其《寓簡》為“於屏居山中,無與晤語,有所記憶,輒寓諸簡牘,紛綸叢脞,雖詼諧俚語,無所不有,而至言妙道間有存焉。已而誦言之,則欣然如見平生,故人抵掌劇談,一笑相樂也。因名之曰‘寓簡’,聊以自娛。”⁵⁵羅大經寫作《鶴林玉露》則往往是“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令童子筆之”。⁵⁶甚或是以文為戲,如葉夢得稱:“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遊戲”,⁵⁷莊綽亦云:“至於酒席之間,亦專以文字為戲”。⁵⁸諸多言說表明,作者創作筆記常常只為聊以自娛,意在“消閑”,不再是下筆伊始就背負起“補史之闕”的重任。

綜上所述,二種筆記敘寫作者最為熟悉的社會生活,表現最真實的情感,集中於日常、個人的問題,其視界,上自宮廷,下至街頭小販。平凡俗事之中,見出新奇,傳達意味,而具有了資閑談與“自怡”的性質,顯示出對傳統筆記紀實性的新發展,既是記錄日常資閑談的自怡之作,亦是自我表達與歷史建構的載體,是為拓展了筆記在表現內容上的寬度和廣度。其關注個體日常生活表現內在情韻的文本因素為後世筆記創作提供了新的審美視角。

(作者: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54 洪邁:《容齋三筆》,《全宋筆記(第五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冊6,頁8。

55 沈作喆:《寓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864,頁105。

56 羅大經:《鶴林玉露》,頁1。

57 葉夢得:《避暑錄話》,《全宋筆記(第二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冊10,頁264。

58 莊綽:《雞肋編》,《全宋筆記(第四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冊7,頁6。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艾朗諾：《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
-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蘇軾：《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呂叔湘：《筆記文選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吳處厚：《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何蘧：《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沈作喆：《寓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范鎮：《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季進：《另一種聲音——海外漢學訪談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 周勛初：《唐代筆記小說叙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 洪邁：《容齋三筆》，《全宋筆記（第五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
- 姚寬：《西溪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莊綽：《雞肋編》，《全宋筆記（第四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 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
- 孫棻：《北里志》。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 掃葉山房輯：《五朝小說大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
-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 張洎：《賈氏譚錄》，《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年。
- 黃進德：《歐陽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葉夢得：《避暑錄話》，《全宋筆記(第二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程千帆：《儉腹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歐陽修：《歸田錄》，《全宋筆記(第一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歐陽修：《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蘇軾：《東坡禪喜集》。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

蘇軾：《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蘇轍：《龍川略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嚴傑：《唐五代筆記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二、論文

李佳：《歐陽修筆記〈歸田錄〉的獨特風貌與文化意義》，《吉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頁35—37。

李晨曦：《〈東坡志林〉、〈仇池筆記〉文體學意義研究》，貴州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李樂凝：《〈東坡志林〉考論》，《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7年第1期，頁54—58。

孫宗英：《轉向閑適的日常：論〈歸田錄〉的體式創格及筆記史意義》，《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頁92—101。

孫宗英：《轉向閑適的日常：論〈歸田錄〉的體式創格及筆記史意義》，《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頁92—101。

許東海：《秋聲·諫諍·歸田——歐陽修〈秋聲賦〉、〈歸田錄〉中的諍臣與困境》，《文學與文化》2013年第2期，頁81—95。

章培恒、徐艷：《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兼談十二卷本〈東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頁163—167。

張海明：《歐陽修〈六一詩話〉與〈雜書〉、〈歸田錄〉之關係——兼談歐陽修〈六一詩話〉的寫作》，《文學遺產》2009年第6期，頁34—44。

程毅中：《漫談筆記小說及古代小說的分類》，《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3年第3期，頁2—4。

劉師健：《〈東坡志林〉：審美趣味與書寫策略》，《求索》2016年第3期，頁161—165。

劉師健：《〈東坡志林〉：審美趣味與書寫策略》，《求索》2016年第3期，頁161—165。

譚磊：《試論〈歸田錄〉對〈唐國史補〉的法與不法》，《安徽文學(下半月)》2014年第4期，頁29—30。

The Style and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about Daily Life in the Casual Notes in the *Guitian lu* and *Dongpo zhilin*

Liu Shijian

(Auxiliary Researcher, Research School for Literature Science,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rough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Wei and Jin to the Tang Dynasty, the casual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were no longer confined to supplementing dynastic history, but aimed at recording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of people around the author. Among the numerous notes, Ouyang Xiu's (1007 – 1072) *Guitian lu* (Records of Returning to My Old Fields) and Su Shi's (1037 – 1101) *Dongpo Zhilin* (Collected Records of Dongpo) stand out for novelty in conveying amusement. They carry on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documentary by recording ordinary life and events, and thereby endow themselves with the nature of idle talk and “self-entertainment”. These aspects mark a new development in the documentary nature of traditional casual notes, which underwent a process of expansion in the breadth of their content. Their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s daily life and expression of inner feelings opened up a new aesthetic perspective for the writing of casual notes i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Guitian lu*, *Dongpo zhilin*, Turning to daily life, Secularization, Humanistic turn